

导演王家卫 戏梦上海

44年前,初出茅庐的王家卫给甘国亮做助理编导,拍摄一部名为《轮流传》的香港电视剧。可惜,因为收视不佳,仅播了二十多集就遭到电视台“腰斩”。

2023年,已然是电影界大师级人物的王家卫,又一次回归了电视荧幕,他监制并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上线。这次不再有“冷遇”,取而代之的是现象级的热度、各大平台的争相播放,以及经久不息的讨论。

《繁花》的海报中间有一段话:“每个人都在等下一个风口。踩对了,逢凶化吉;踩错了,万劫不复。”这次,他踩对了。

“不响是一种留白”

《繁花》这本书一共31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千头万绪。”电视剧上线之际,王家卫饶有兴趣地说起,原著里面“不响”二字出现了1000多处。“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

“凡是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的、为难别人的,不响。”这是王家卫作为创作者的态度。王家卫很早就在作品中表露了这种态度。“不响”经常是内心的独白,孤独自闭的人物,因为害怕受伤,自说自话,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不响”可以是绝美的自然,碧蓝的长空、城市的霓虹、猎猎的西风、孤寂的人影……王家卫在电影《东邪西毒》中提问:“山的另一边是什么?”他不强求一定要越过山丘,镜头下失群的骆驼、招摇的布幡、碧血、黄沙、落霞都是他的答案。

“不响”还可以是无尽的狂想。有

人将其电影《2046》视作《花样年华》的续集(两部电影均由王家卫执导),关于未尽的爱情,王家卫讲述了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我只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王家卫说,“不响”是原著的精髓,也是自己改编《繁花》的密码。“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繁花’。”王家卫又说。

父亲烟盒上的故事

有段趣谈。当初拍戏拍得辛苦,演员张震就找王家卫抱怨。张震说了很多,王家卫只是很认真听着,不作评价。等到张震把苦水都吐完,王家卫淡淡地说:“在这一根烟的时间里面,小鬼,你就长大了。”像父亲的口吻。

王家卫自己的成长常与电影相伴,其中,他的父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生于上海,5岁时随家人定居香港。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父亲在酒店工作,要上夜班,晚出晚归。

王家卫曾回忆自己刚到香港不久,父亲就带着他去看一部名为《浴场谋杀案》的电影,第一个镜头,便是一个女人穿着浴袍,垂死之姿。那个画面后来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还有一次,父亲带他去看《甲午风云》。王家卫说,自己有感于民族英雄的悲剧,极其愤慨。“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这部电影在我童年里面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沉浸在电影中,王家卫一天天成长起来。等到他真正执导电影,已是1988年的《旺角卡门》。这一年,他正好30岁。

正在人们都认为,这位年轻导演将延续着这条犯罪片道路狂奔的时候,他的下一部作品却令所有人跌破眼镜——《阿飞正传》。1990年,这部作品刚上映时收到的骂声,绝不比它后来收到的赞誉少。

王家卫的父亲似乎也很心忧。他对王家卫说:“我认为你拍得还不错,《阿飞正传》太文艺了,我替你写了一个剧本。”王家卫看到,父亲抽完烟,纸盒不扔,而是展开后,拿笔在上面写故事、写剧本,写的是五个女人在香港的故事。

“他其实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他关注我后面在拍什么,他认为我有问题,不行就替我写一点,让我去搞。”后来,王家卫将父亲烟盒上的故事用在了自己的作品里。他的成长,似乎也只有一根烟的时间。

故园无此声

王家卫一个鲜明的标签,是上海。上海气质,上海精神,上海做派,上海品格。但上海的那些人、那些事,更多是他从父母口中听来的。

他的童年记忆里,每天夜里两三点,父母会坐在一起吃宵夜,一谈心就是两个小时。“我有些时候就睡了,有些时候醒着,醒了就听他们在讲话,所以我有很多他们的故事在里面。其实我所谓的上海,不是今天的上海,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上海,而是他们嘴巴里的上海。”这也是《繁花》中,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

他还记得自己离开上海前的一些生活片段:“母亲下班领我回家,从武康路走到淮海路,那些树啊,影响,和经过上海交响乐团训练地听到的音乐。”

“老上海的梧桐树冬天刷着防冻的石灰。”王家卫曾无不感慨地

说,“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今天我感觉它消失了。”故园无此声。

王家卫要找回这种感觉,他找到了,他遇到了《繁花》。

开拍前,王家卫对原著作者、作家金宇澄说:“这部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补白了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来香港后的上海生活面貌,你写的,是我哥姐的事。”王家卫的哥哥姐姐,还有二十多个表兄表姐,一直生活在上海,他们跟《繁花》里面的人物,基本上是同一代人。

从“故园无此声”到“故园有此声”,王家卫想和观众一起探寻,这些年大家经历了哪些,留下了怎样的集体记忆。所以观众们能看到,剧集中几乎都是上海籍演员,除了辛芷蕾饰演的角色来自外地,全程说普通话,其他主要演员、配角都说上海话。

观众们也能看到,剧里道具妆容几乎无懈可击,新婚的红色外套、绍兴“飞天”黄酒,包括当时人们的发型、仪容,衣食住行都很考究。观众还能看到,剧组花了大功夫,在海量考据的基础上,1:1复原搭建了200多米的黄河路,以及撑满天的霓虹灯、地毯厚的烟花纸。

比起视觉上的真实,其实王家卫更在意的,是感受上的真实。“也许观众在看我们的剧的时候,会认为某些场面太过繁华。那是因为我们要还原的是当时的人,当时的感受。”有一个小细节,王家卫曾经和金宇澄重游上海黄河路,而今的黄河路早已不复当年饭店云集,生意宝地的旧影。金宇澄大失所望:怎么和记忆中不一样了?王家卫说,不是黄河路不一样了,是你不一样了。这番话颇有点像30年前,他在《东邪西毒》结尾的留白:幡也没动,风也没动。因为心动了。

据《现代快报》王子扬/文

黄家兄弟让徐悲鸿“逢凶化吉”

陈嘉庚与徐悲鸿二人能够相识,得益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福建人黄孟圭。

1925年黄孟圭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徐悲鸿留法已逾6年,当时生活无着,甚至要靠朋友接济度日。1925年秋,在中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的介绍下,徐悲鸿得以认识正在法国考察的黄孟圭。

黄孟圭到徐悲鸿住处参观过他的画作后,对他钦佩不已,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位年轻画家的窘迫。由于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每月会寄20英镑给黄孟圭供其留学、生活之用,黄孟圭便从这笔生活费中拿出一些分给徐悲鸿,以解其燃眉之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考虑到南洋华侨众多,其中不乏富商,黄孟圭便建议他去南洋办画展,一来可以展示自己绘画的成果,二来可以向侨领筹集学费。

黄孟圭二弟黄曼士当时正在新加坡经商,担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总经理。为了帮助徐悲鸿,黄孟圭立即写信给黄曼士,请他帮忙想办法。黄曼士很快复信大哥,愿意介绍徐悲鸿给南洋侨领画像。

1925年11月初,徐悲鸿随黄孟圭从法国乘船来到新加坡,这是徐悲鸿第一次到新加坡。黄孟圭、黄曼

士兄弟热情招待了徐悲鸿,黄曼士还把徐悲鸿留在了自己的“百扇斋”内居住。黄曼士当时已是新加坡华侨界名流,“百扇斋”则是新加坡文艺界荟萃之所。

1925年冬季的一天,黄孟圭将徐悲鸿带至陈嘉庚在新加坡怡和轩的办公室。这是徐悲鸿与陈嘉庚的第一次会面。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与徐悲鸿语言不通。经黄孟圭一番介绍,陈嘉庚才知道,眼前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便是已在画坛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徐悲鸿。

在黄孟圭向陈嘉庚介绍了徐悲鸿此行的来意后,陈嘉庚当即同意由徐悲鸿为自己画像。很快,徐悲鸿为陈嘉庚画了一幅油画像,陈嘉庚很是满意。后来据徐悲鸿回忆:“陈君以两千五百金谢吾劳。”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为了答谢陈嘉庚,徐悲鸿又画了马克思和托尔斯泰的两幅油画,赠送给了陈嘉庚所办的厦门大学。

正是由于黄氏兄弟的引荐,徐悲鸿才得以结识陈嘉庚,并得到其资助。后来,徐悲鸿将黄孟圭、黄曼士视为他平生知己。徐悲鸿曾说:“本生遇黄,逢凶化吉。”终其一生,徐悲鸿都尊称黄孟圭为大哥,黄曼士为二哥。

据《寻根》董立功/文

